

北江盆地

——宗族、聚落的形态与发生史研究

钟 翀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序

展卷阅览本书的读者，都会为作者的独特观察与精彩演绎所吸引，并在掩卷之际沉浸在深深的感慨之中。虽然我对这篇小序能否将鄙人的评价准确传达给贤明诸君有所不安，但有感于钟翀君不同寻常的求学经历，且他的这部著作即将由中国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刊行，故于欣悦之余，将本人对有关钟翀博士及本书的所见所闻，略记一二于下。

2000年春，钟翀君在他硕士导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推荐之下，以一介中国青年学子身份毅然东渡求学于扶桑，顺利考入京都大学人类环境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并以其不懈努力与卓然悟性，取得神速进步。本书主要部分的内容，正是钟君于在日博士学位论文《東南中国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形成と構造に関する歴史地理学的研究—浙江省東陽県北江盆地の宗族社会を中心に—》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该博士论文的审查，得到鄙人及当今日本中国史代表学者京都大学爱宕元教授、中国历史地理学代表学者滋贺大学秋山元秀教授、以GIS研究历史地理闻名的京都大学小方登副教授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参与论文评议的这几位先生，在时下日本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者之中，尤以善于积极且批判性地汲取新研究成果、孜孜追求跨学科新研究而享有盛誉，而他们在对该文的审查过程中，也均为作者的慎思明辨与畅达日语所叹服，这已是2006年初的事情了。

当然，钟君此书的出版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此前他已在中国地理学会年会获得“青年优秀论文奖”，并在日本地理学刊物中审稿最为严格的《人文地理》上全文发表论说类论文，如此种种锤炼，形成该篇博论的核心文脉。2006年3月，他在京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人类环境学）之

后,并未立即将此论文予以出版,而是不断取舍、修改,在保留原文框架基础上对其中若干重要内容加以更深入的钻研,几经充实、完善,如此又数历春秋,本书方得问世。

在较短时间中获得如此成果当然归因于钟君的能力与勤奋,也得益于2006年归国后受聘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旋以讲师晋升副教授的际遇。钟君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在该校历史学领域得到评价,该校的识见与2004年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为期一年的特别研究员(21世纪COE项目“东亚世界人文信息学研究教育基地——为了汉字文化的全面继承与发展”)的经历,对钟君来说均可谓天赐之惠。因此,我要在此深深感谢国际汉学重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著名学者、该项目主持人高田时雄教授及该项目主要的事业推进负责人富谷至教授给予钟君的眷顾。以鄙人所见,正是历经上述种种曲折,并因钟君有此二方面的熏陶和经历,才有此书的诞生。

对东南中国、对该地宗族社会的关注,已非新鲜课题。不过,1960年代以降考古学的新成果,对自古以来的东南中国历史观足以构成推动变革的挑战。钟君有感于“原生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是东南中国形成富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地域之关键”这一认识在历史地理学界尚未充分推展,于是由此认识出发,遍涉海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学者为主的东南宗族研究。在此过程中,钟君逐渐洞察要解决现今东南中国历史观的认识矛盾,则需从底层社会入手,而以该地域底层社会的实际研究状况而言,宗族与乡村聚落研究实为解决问题、构筑新史观之有效途径,遂决意从事宗族、聚落研究。本书即为他历经十年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研究法、材料运用等方面均给人以面目一新的感觉,值得给予高度评价。本书给人许多启示,在此先将鄙人对本书主要研究思路的评价归纳为以下八点。

其一,本书对于既往研究成果与相关研究课题,力求在必要的学术分野中予以全面透视,由此方能立足理论高点梳理整体的研究脉络,正

因如此,在本书的考察之中,时时可见作者富有创意的思辨,此类研究成果在本书中竟达俯首可拾之程度。其二,从序章至于终章共设八章,其论理、实证之展开,均循宗族聚落的形态与发生这个主题一以贯之。其三,东南中国之一大特点在于该地发达的宗族社会,前人的研究虽已通过解读族谱揭示该种特质,但本书更进一步针对既往研究中存在的研究对象地域未能选取该类宗族社会的发生策源地;针对既往研究对族谱的史料性质及其丰富记录之史料价值、族谱分布和残存的不均衡性等方面的认识未能深化,以致对该类资料进行有效、批判性的分析利用之时产生种种问题的困境,本着解决目前宗族研究中诸种问题的明确目的,选取研究对象区域——即本书标题所示“北江盆地”这样一个地域单元,此种有意识地选取典型地域来开展模式研究的做法,在同类研究中,洵为克服研究偶然性、随意性的一大创举。

其四,在本书中,作者对于宗族这一同姓父系亲族集团的私修史书——族谱,作出多项创造性的发掘与研究。通过在北江盆地的颇为彻底的田野调查,作者对该地族谱的传存状况有了十分精确的把握,这为最大限度利用此类独立于正史、方志之外的史料,发掘其研究价值,并为后续论理、实证的展开奠定坚实基础。

其五,与之同时,对于像族谱这样精确到个人层面上的微观历史记录,作者大量运用地图化、量化的分析手法,这不仅为宗族社会研究带来焕然一新的资料价值,也为族谱考察之于聚落史地研究的重要性提供一种全新诠释。其六,以上的研究推进,也为谱牒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建构,创造了新的成长空间。

正因如此,该书的成果,除历史地理学之外,也为人文地理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史料学、方言学、地域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证资料,理应获得跨学科的评价,这是鄙人的第七点评价。其八,该书的成果,为此类研究进一步的展开指明方向。鄙人以为,欲求东南中国之特质,则需超越目前的学术领域与现代国家的界限,不仅在中国、而且应在东亚、东南亚、乃至世界视野中

来加以探索。

本书作者以浙江省东阳县北江盆地为研究对象地域,在将该地的宗族社会与族谱分析紧密联系加以研究之前,首先指明该地实为本书研究课题之最重要、最典型地域。本书各章的内容大致如下:序章提出研究目的,阐述北江盆地作为研究对象地域的必要性;第一章在纵观北江盆地这一历史文化地域形成历程之后,对该盆地内乡里、聚落的历史展开作了必要的考证与说明;第二章系统整理了现存于北江盆地的族谱群,并对其资料价值与特性作出分析;第三章通过谨慎细致的个案考察,揭示该盆地现存宗族村落的面貌,并对各种宗族聚落的发生演化展开深入探讨。

在第四章中,凭借对北江盆地庞大族谱记录的系统整理,作者网罗了现存于该盆地的大小大小 183 个宗族的始迁祖及创始初期的记载,并对之展开全面的统计分析,通过对宗族空间形态的类型化处理及其发生年代的精致分析,阐明该地的宗族形成史,同时对其时空发生特质作出创造性的理论归纳。在此后的第五章里,作者通过精彩的史料批判,从文献学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北江盆地相关族谱的编纂史,并以此为基础,以向来未受重视的族谱中女性配偶者记录为突破口,对族谱的始迁祖重构模式以及此类记载的真伪判别展开深入分析,最终推定宋元时代该地宗族集中发生这一历史过程的实际形态。在本章中,作者还对族谱编纂者的意识构造及其表象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探讨,并力图创建宗族研究与族谱研究相互联系的若干重要规范。

立足于以上的论证,在第六章,作者以集中分布于北江盆地及其周边的“斯”这一“族姓”为中心,通过对其空间构造与发展史的细腻整理和坚实考证,为古代以来的宗族演化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证事例。在最后一章,作者不仅简要回顾了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而且提出将北江盆地作为东南中国宗族社会发生与成型的一个模式,并为今后进一步的课题展开提出了他的计划。

毋庸置疑,本书将对东南中国研究、宗族社会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产

生直接影响,当然也将有资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并为史科学、地域研究、历史 GIS 研究等学问的积累提供素材。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钟君为开展此项研究,自 2001 年以降共计 15 次在北江盆地实施了艰苦的田野调查,并在上海图书馆及东阳县各地收集查阅 500 部以上的相关族谱资料,其中仅以族谱行传中的女性配偶者记录而言,其精查之数就达 2 万例之多。如此庞大而单调的作业,为本书的完成打下扎实的史料基础。本书末尾所附两张大型表格,其本身就已显示相当的数据库资料价值。据我所知,钟君能够在熟练利用计算机统计技术上得心应手,在地图绘制上取得精致入微的效果,这也跟他长期的、认真的田野调查分不开。

就地图的研究运用而言,应该说日本地理学界较中国发展更早,因此在这一方面我对钟君也尽可能给予了特别指导,所幸这一努力已经反映到本书之中。不仅如此,日本人文地理学界倡导“在积极开展田野调查、通过地图处理将地域与空间物象可视化的基础上,将地域研究中的理论考证与知识趣味有机结合,通过空间实感来加以分析体验”的研究方法,至今已有《德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浮田典良著)、《日本古代地理研究》与《中近世都市的历史地理》(足利健亮著)、《地域的构造》(青木伸好著)、《都市规划的研究》与《幕藩社会的地域构造》(矢守一彦著)等代表性的成果问世。这些名篇佳作中除最后两种之外均为鄙人所在京都大学教养部人文地理学研究室的先贤所著,钟君恪守鄙人训导,潜心钻研上述研究法并成功加以运用,因此,本书的成果,也可以说是敝处的传统与学风在中国开花结果之证。

另一方面,日本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流是意识到与历史学相异之处而设定“时间断面”来进行地域考察,对于此种方法,本书阐明了跟历史动力论脱节的静态研究的问题所在,并进一步发展了历时性研究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不仅对中日双方历史地理学研究来说都富于启迪,也对历史地理学之外与本书相关的宗族学、谱牒学及东南中国研究等各个学术领域的发展有所贡献,并且,在时下概念研究席

卷欧美地理学杂志、地图与地图化研究遭受冷遇之际,作者再次提起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我想这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就我本人的理念而言,本书也是成功实现“综合运用多种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用以探究地表上现存或既存现象之地理表现样式”这一地理学使命的优秀作品。

当然,仅就族谱而论,像本书第二章所载《百年前的李宅村》那样的一些历史图像,若能加以深入利用,则可在社会空间、景观学等方面对宗族聚落展开更为立体的考察;另外,若能进一步留意土地开发的时空展开历程、地形与水文条件所决定的河谷平原多样性等因素跟宗族社会发生形成的关系,则能发展出更多富有魅力的研究,钟君已经认识到这些课题跟博士论文支柱之一的多尺度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鄙人殷切期待,本书以及作者今后的持续研究,将在中国乃至海外相关学界的宗族与谱牒研究地平线上树立一座新的地标。

金坂清则于日本京都粟田山庄,2011年春

翻译:陈捷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相关研究小史与本书研究目的	4
三、研究对象地域与研究尺度	9
第一章 东阳县与北江盆地	14
第一节 文化史地视野中的“浙东”与“东南中国”	14
第二节 东阳这个地方	19
第三节 北江盆地：乡里与聚落的历史展开	30
第二章 北江盆地的族谱群	41
第一节 东南中国的族谱	42
第二节 “北江谱”的现存状况	46
第三节 “北江谱”的流传与普及	52
第三章 宗族与聚落概观	58
第一节 个案考察：鹿峰蔡氏的形成与展开	59
第二节 北江盆地的聚落面貌	81
第三节 北江盆地的宗族生态	111
第四章 宗族发生的时空变迁	126
第一节 宗族发生与族谱的始迁祖记录	127
第二节 宗族发生的空间形态	130
第三节 宗族发生的时间变化	143

第五章 宗族的形成与乡村社会的“宗族化”	159
第一节 宗族三要素的出现与宗族发生的 时间关系	160
第二节 北江盆地族谱编纂史概观	163
第三节 族谱所见之始迁祖与宗族发生真相	176
第四节 从族谱编纂史看乡村社会的“宗族化”	191
第六章 宗族变迁的前史	
——古代望族斯氏的族姓演化历程	200
第一节 当代斯姓的历史地理	202
第二节 斯氏谱所见之宗族形成史	208
第三节 古代斯氏的族姓原貌	223
结 论	236
一 总括与要约	236
二 对东南中国史地研究的启示	237
三 今后的课题与展望	238
后 记	324

绪 论	1
一 研究缘起	1
二 相关研究小史与本书研究目的	4
三 研究对象地域与研究尺度	9
第一章 东阳县与北江盆地	14
第一节 文化史地视野中的“浙东”与 “东南中国”	14
第二节 东阳这个地方	19
第三节 北江盆地:乡里与聚落的历史展开	30
第二章 北江盆地的族谱群	41
第一节 东南中国的族谱	42
第二节 “北江谱”的现存状况	46
第三节 “北江谱”的流传与普及	52
第三章 宗族与聚落概观	58
第一节 个案考察:鹿峰 蔡氏的形成与展开	59
第二节 北江盆地的聚落面貌	81
第三节 北江盆地的宗族生态	111
第四章 宗族发生的时空变迁	126
第一节 宗族发生与族谱的始迁祖记录	127
第二节 宗族发生的空间形态	130
第三节 宗族发生的时间变化	143
第五章 宗族的形成与乡村社会的“宗族化”	159
第一节 宗族三要素的出现与 宗族发生的时间关系	160
第二节 北江盆地族谱编纂史概观	163
第三节 族谱所见之始迁祖与宗族发生真相	175
第四节 从族谱编纂史看乡村社会的“宗族化”	190

第六章 宗族变迁的前史..... 199

 第一节 当代斯姓的历史地理..... 201

 第二节 斯氏谱所见之宗族形成史..... 207

 第三节 古代斯氏的族姓原貌..... 222

结 论..... 235

绪 论

一 研究缘起

时至今日,中国仍是一个农耕人口占多数的农业国。上万年来的禾本种植文明,对于这个面积与整个欧洲相当的次大陆规模大国来说,无论在国家尺度上的传统与制度的形成,还是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思维的塑造,都产生深刻而又多面的影响。那么,构成这个农业大国基底的乡村社会,究竟是呈何种面貌、又是经由何种历程演化而来的呢?如此庞大的设问,仅作出简单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在对这个国家乡村社会进行地域区分的基础上,由表及里地开展方方面面的观察和检讨。

就近代西方的农村地理学而言,其出发点起于对农村民众居住空间集聚程度的关心,由此产生所谓乡村聚落的集村(village)与散村(dispersed village)的二元分类。一般来说,规模较大且居住较密集的称为“集村”,反之则称“散村”;这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过,此种从有关村落规模、形态的单纯分类出发,进而觉察农村生活空间具有的地域性差异,复以历史、文化、景观、族群、功能等角度探究产生差异的种种因素,乃至对村落的形成、演变给予深刻解释的研究,虽然不脱自基本的二元论约定循序渐进、而及于生成理论体系的西方思辨传统,但确也有益于对中国乡村这样一个意象纷纭的庞大复杂体进行清晰、客观的观察与梳理。

事实上,现代中国宗族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开创者莫里斯·弗里德曼对东南地区的宗族研究,也是先从村落的聚集度这一角度入手的,在

他的名著《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开篇谈到：

在中国，虽然几乎所有地方都存在着民居聚集度的差异，但集村仍是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宗族(clan，书面语一般作 lineage)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在福建、广东等地，存在着显著的宗族(lineage)与村落相一致的倾向，也就是说，有许多村落都是由单一宗族(lineage)构成的。跟中国其他地区、即使跟华中一带相比，像这样父系单系世系(agnatic)和地方社区(communitiy)相重合的形式，也以东南地区最为显著。^①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弗里德曼的观察甫一展开，即涉入中国东南部传统乡村社会中一项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宗族与农村聚落相重合”即所谓的“宗族村落”这一现象。众所周知，宗族是我国及周边国家极富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在东亚大陆之中，宗族组织的发达程度，又以我国东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最为突出。那么，像中国东南乡村这样的大规模宗族发达地域，却是为何、经何种过程发育起来的呢？该地的聚落，为什么会走上跟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发展道路，而演变成如此特异、并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宗族集村群落”(图 0—1)的形式呢？事实上，这一贯穿宗族发生发展的基础性课题，曾在宗族研究中困扰诸多学者。弗里德曼就曾坦言：

就我个人所见而言，关于“跟此种地域特异性相关的因素是什么”这一点，至今尚未见令人满意的调查。按中国人的说法，东南中国是汉文化族群相当晚近才得以开发的地域，这就是福建、广东一带居民往往自称唐人而不称汉人的原因。但是，现在还难以正确解释为何此类宗族在其他地域都趋于解体甚至趋向消亡的大背景之下，该地宗族仍得以存续这一问题。不过，虽然在我的文章中

^① Maurice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8, p.1.文中同时使用 clan、lineage 两词来表达“中国的宗族”，不过这两个词汇在英文中的准确含义分别为“氏族”、“世系群”，并不与中国的宗族概念完全对应，所以或许用 the Chinese Lineage 一词更为妥当。

相对活跃的华中和华南,宗族的结合相反地却更占优势,这究竟原因何在?从文献上看,至迟从宋元以来直到清末,中国受欧美文化影响应该是渐次增强,但宗族结合却反而是随时代推移逐渐强化、扩张。那么,为什么完全看不到它的衰弱过程呢?要对以上疑问提出充分的解释,以现有的研究积累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或许需要考虑历史、社会、经济等多种影响因素,甚至其中还有历史上原住民族的影响也未可知。^①

弗里德曼和牧野巽的疑问,可以说在大方向是一致的,这就是——看似与社会发展逆向而行的宗族组织,何以发生?并且,为何能在近代化浪潮之中得以存续、发展,甚至不断强化、普及?只是牧野巽的设问更为具体一些。

二 相关研究小史与本书研究目的

紧接上节议论,本书的考察,缘于对“现今所见之东南中国宗族发达地域何时形成、该地大范围宗族聚落的普及何以发生”的探究,笔者以为,以目前学界相关研究的到达点,这样的探究需循着“近世型宗族研究”这条线索方可展开。下面,简要回顾与本书密切相关的既往研究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目的。

本书以“近世型宗族”为考察对象,因此首先有必要说明本书所使用的“宗族”一词的涵义。

所谓宗族,按一般的理解,就是由“本宗”(即男系血亲及其配偶)结合而成的亲族群体,该群体不包括“外姻”(即与婚姻关系相维系的母族或妻族),也就是《尔雅·释亲》所说的“父之党为宗族”。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不满意上述强调宗族血统纯洁性的单纯解释,如近年来钱杭提出完全舍弃“血缘关系”一词,推崇强调相邻世代的连接规则和连接形式的“世系关系”这一用语,力主以“父系世系集团”来解释中国的宗族^②。

^① 牧野巽:《牧野巽著作集》第一卷所收《近世中国の宗族》,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79, pp.121—122。此文初出于1941年。

^② 钱杭:《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还有的学者则更进一步地认为,必须注意到宗族的政治内涵。如费孝通就曾指出“在农民中间的宗族组织是一种地方组织,而不是一种亲属组织”^①;弗里德曼也认同费氏的观点,主张至少在东南中国所看到的宗族当然应该是政治与地方组织,因为“假如我们不能体会到这一点、并且认为它是扩展了的家庭的话,我们肯定会诧异于它们是如何在一个复杂而又存在差别的社会中得以延续。”^②无论如何,宗族具有文化涵义和社会性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否则就难以因应社会冲击而得以长期存续;但若就东南一带的宗族实践来看,任何宗族的世系构成和维护,都要基于特定的父系血亲规则这一基本面也是不可否认的。因此,笔者以为,在重视实地考察的宗族研究中,把宗族看做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特定的血缘集团、社会组织两面性的群体形式,是具体分析时应该持有的态度。关于这一点,通过本书后文分析也可进一步加以体会。

事实上,学界对宗族认识的种种分歧,正反映出宗族现象之丰富与复杂。在中国,宗族因其丰富内涵与悠久历史,随着时代、地域不同而形成了诸多变化类型。所以,客观划分这一蕴涵多重累积变化并拥有众多实体的复杂社会事象,是开展此项研究的必要手续;而就史学研究来说,如果承认宗族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事物,那么对宗族发生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时期划分,就是需要首先开展的工作。

早在1934年,陶希圣就提出中国家族制度分期说,他将我国家族制的变迁划分为西周到春秋的宗法时代、战国到五代的亲属组织族居时代、宋以后的家长制家族时代、20世纪以后的夫妇制家族世代这四个时期^③。1942年,日本社会史学者清水盛光透过传统史书对我国家族及组织的描述,勾勒出宗族大致发展轮廓及其基本演化类型——即殷周时代的所谓“宗法式宗族”形式;春秋以后随古典封建制崩溃、自秦汉至于唐代自然发生式的宗族集团形式;宋代以后重启周代宗法并根

① Fei Hsiao-Tung, “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2, Vol.52.No.1, p.5.

② Maurice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58, p.2.

③ 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63—95页。